

中国的收入分配

与总消费

杨天宇◎著

理论和实证研究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本书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CJL010)资助

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 ——理论和实证研究

杨天宇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杨天宇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017-8931-3

I. 中… II. 杨… III. 国民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研究
-中国 IV. F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657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严莉 (电话:010-68308159; Email: hubeiadele2000@sina.com)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任燕飞设计室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印张:8.25 字数:213千字

版 次:2009年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7-8931-3/F·6921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电话: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12390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4187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 论 / 1

- 1.1 问题的提出 2
- 1.2 研究的基本框架 5
- 1.3 本书的主要价值和不足之处 9

第二章 消费理论的批评性回顾（上） / 13

- 2.1 绝对收入假说及其缺陷 14
- 2.2 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 17
- 2.3 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消费理论 22
- 2.4 对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的各种替代性假说 29
- 2.5 行为消费理论 40
- 2.6 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 43
- 2.7 总结和评论 52

第三章 消费理论的批评性回顾（下） / 55

- 3.1 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 56
- 3.2 西方社会学的消费理论 61
- 3.3 相对收入假说 69
- 3.4 炫耀性消费理论的发展脉络 72
- 3.5 总结和评论 75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 / 79

- 4.1 运用国外主流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 80
- 4.2 运用西方非主流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 91
- 4.3 创立中国式消费理论的尝试性研究 101
- 4.4 总结和评论 110

第五章 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上） / 113

- 5.1 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问题 114
- 5.2 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的理论框架 116
- 5.3 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的计量验证 127
- 5.4 总 结 139

第六章 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下） / 143

- 6.1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144
- 6.2 满足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最优收入差距 147
- 6.3 满足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镇内部最优收入差距 ... 154
- 6.4 我国城乡及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 163
- 6.5 总结 165

第七章 技术创新、就业机会与总消费 / 169

- 7.1 技术创新与总消费 170
- 7.2 就业机会与总消费 173
- 7.3 技术创新、就业机会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 ... 179
- 7.4 技术创新、就业机会影响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 ... 181
- 7.5 总结 197
- 附录部分 198

第八章 社会保障对总消费的影响 / 205

- 8.1 社会保障影响总消费的文献回顾 206
- 8.2 社会保障影响总消费的理论模型 209
- 8.3 中国社会保障影响总消费的实证分析 213
- 8.4 总结 220

第九章 启动消费的收入分配政策 / 223

- 9.1 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方向和重点 224
- 9.2 城镇低收入阶层与农民阶层的消费行为 232
- 9.3 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对启动消费的作用 237
- 9.4 收入分配秩序的不规范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约 240

参考文献 / 244

第一章

导论

导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等。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变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组织的变革、农村金融组织的完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等。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业务的变革、农村金融业务的完善、农村金融业务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管理的变革、农村金融管理的完善、农村金融管理的创新等。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等。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变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组织的变革、农村金融组织的完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等。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业务的变革、农村金融业务的完善、农村金融业务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管理的变革、农村金融管理的完善、农村金融管理的创新等。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等。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体制的变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组织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组织的变革、农村金融组织的完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等。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业务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业务的变革、农村金融业务的完善、农村金融业务的创新等。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金融管理的改革包括:农村金融管理的变革、农村金融管理的完善、农村金融管理的创新等。

1.1 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居民消费不振、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消费不振的长期持续,导致了很多问题,如消费品行业长期不景气,消费品价格不断下降或者涨幅低于原材料价格涨幅,导致消费品行业利润和工资受到挤压,储蓄率和投资率偏高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此外还有国内消费不足迫使企业扩大出口,由此导致的贸易顺差、外汇占款过多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等问题。虽然消费率偏低除了居民消费不振之外,还有政府消费不振的问题,但居民消费近年来一直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远远超过政府消费所占比重,所以仍然是导致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①。可以说,居民消费不振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刺激居民消费对解决很多宏观经济问题都是有好处的。

国内学者在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对消费不足的解释。包括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加、攀比效应、东方人的财富偏好和遗赠动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阶层地位差别、外

^①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李扬、殷剑峰(2007)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得出,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平稳,因此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企业消费不足。这个差别可能是统计口径造成的。但即使是按照李扬等人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居民消费率仍然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由于居民无论在哪个统计口径中都是总消费中比重最大的主体,所以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仍然是总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生储蓄目标导致的短视行为等等(见本书第四章)。所有这些研究都为理解我国居民的消费不振提供了很好的见解。这些观点使我们认识到,消费不振的出现,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大国来说,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因此,与其说这些原因是互相替代的,不如说它们是互补的。

以上种种解释虽然各有优点,但本书将主要把研究重点放在收入分配对居民总消费需求的影响上。这样做的原因是:首先,上述所有原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收入分配影响消费需求的框架中,因为几乎所有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对不同的收入阶层都是不相同的。以预防性储蓄为例,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风险会增加,因此会更多地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会导致消费不振。的确,风险和预防性储蓄在近年来对中国居民消费决策的影响很大,许多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朱国林等,2002),享有不同社会保障的不同阶层所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赵卫华,2004)。换言之,即使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很大,但它同样也可以纳入收入分配的框架里去。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消费需求问题,有利于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变量的影响。其次,在所有导致消费不振的因素中,目前周期性因素已经缓解,各种长期性因素虽仍然存在,但也并未恶化,只有收入分配因素在最近几年中持续恶化。如果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所占的比重可能在不断扩大,该因素对解释居民消费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本书将重点关注收入分配对居民总消费需求的影响问题。

对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见本书第二至第四章)。不过,应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主要的困难有两点:第一,无论是西方主流消费理论,还是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凡是认为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有

影响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认同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①。但如果以此为基础来实行以扩张消费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我们将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即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如果通过再分配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移给中低收入阶层,则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上升,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下降,二者有可能是互相抵消的。这就是说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是严重不确定的^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社会学理论从阶层地位和外部性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但这个论证是经济学界难以运用的,原因是他们在论证中使用的都是难以量化、难以验证的社会学概念。上述两个问题,导致了迄今为止大量有关收入分配、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这实际上说明了理论的缺陷。

实践告诉我们收入分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但理论却无法给我们提供站得住脚的思路,这正是笔者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虽然难度很大,但笔者相信,通过研究收入分配以解决消费不振问题,进而解决或缓解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最后还要指出,本书题为“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特指收入分配对总的居民消费需求(Aggregate Consumption)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体居民消费需求(Individual Consumption)的影响。在许多地方,我们把“总消费”、“居民消费”和“居民总消费”当作同义词来使用。

① 主流学者也同样认同这个规律,如勃兰德(Blinder, 1975)的理论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但他的计量方程却采取了和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完全一样的形式;卡罗尔和金博尔(Carroll and Kimball, 1996)则在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基础上证明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成立。

② 笔者把它叫做“凯恩斯悖论”,本书第二章和第五章都对该悖论作了详细论述。此外,第四章第二节综述中提到的王朝阳(2002)的观点也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提出了很有道理的质疑。

1.2 研究的基本框架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按如下顺序安排的:

第二至第四章对国内外的消费理论进行了批评性的回顾。第二章总结了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自凯恩斯以来,主流消费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理性预期下的随机行走假说→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代表的新假说→行为消费理论。本书对上述假说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这些理论在形式上是非常规范的,但它们过分追求“微观基础”和“标准模型”的构建,并普遍运用了不切实际的“代表性消费者”假设。这使得它们越来越远离现实,难以建立直观的显性消费函数,在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时不得不采用检验一阶条件等间接方式。这迫使研究者倾向于运用花样翻新的计量技术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计量结果对计量方法、数据处理都相当敏感,理论问题因此和计量技术本身的问题混合在一起,使得对任何一种假说的评价都十分困难,应用这些理论模型解释实际问题也因此越来越不可靠。除此之外,这种研究方法的采用也导致了模型的可预见性和可检验性下降。众多非常前沿的模型其实和它们预言或解释的事实并没有“排他性”的关系,这意味着它们并不符合科学哲学中拉卡托斯科学进步的条件,即使它们运用计量技术的间接检验成功了,也难以证明这些模型的成立。所以,虽然主流消费理论对我们理解消费问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它的缺陷导致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弱。尤其是对于我们关心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来说,主流理论中的勃兰德模型对此作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论证,但它同样存在上述可预见性和

可检验性差的问题,难以作为我们解决中国消费不振问题的基础。

第三章回顾了西方非主流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西方社会学的消费理论、相对收入假说和炫耀性消费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放弃“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从分析社会各阶层消费行为差异的角度去研究消费行为。这种研究思路是比较接近现实的,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消费问题的有益借鉴。不过,这些理论也有一个共同缺陷:它们都运用了类似于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分析方法,即在设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时,不考虑其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而仅仅考虑其消费的外部性,即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考虑的是阶层地位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可检验性,因为我们难以用任何工具来衡量外部性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理论的推理能否成立,是值得怀疑的。上述缺陷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重视非主流消费理论派重视社会阶层、消费关系的思路,但不能照搬他们的分析方法。

第四章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消费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追踪国外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并运用其理论解释中国消费问题;二是对西方非主流的消费理论作进一步研究,并用来解释中国消费现象;三是试图建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式消费理论,并用来解释中国特有的消费现象。从对这些理论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的消费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但仍以模仿式研究为主,这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理论模型模仿国外消费理论,未反映国情差别;二是缺乏对理论基础的重视。这说明中国消费理论与西方的差距还很大,需要进行以中国国情为研究背景的“原创性”研究。

第五章对建立中国式消费理论进行了尝试。首先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详细分析了在边际消费倾向(MPC)与收入分配呈

各种关系时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表明只有当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时,收入再分配政策才能有效增加总消费。然后通过计量分析证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大致呈倒“U”型分布。这个结论与随机行走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等西方主流消费理论对相同问题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却符合中国国情。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更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的结论。

第六章从两极分化的角度再次考察了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对于总消费没有影响。由于高、低收入者之间消费率的差别,即使忽略中等收入阶层,仅仅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也会对总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本章通过建立模型和计量验证,估算了我国有利于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城镇内部最优收入差距,以及现实收入差距与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程度。结果发现,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扩张的城乡、城镇内部最优居民收入差距都比较低。而我国实际的城乡、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都高于最优路径,而且偏离最优路径的程度正在不断扩大,这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恶化的趋势。此外,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所以与城乡差距相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要扩张居民消费,解决经济增长所受到的需求束缚,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使其逐渐向收入差距的最优路径回归。本章的分析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可操作的参照系。

第七章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对总消费的影响。之所以

要研究这两个因素,是因为它们对总消费的影响,可能与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是互相替代的。从理论上说,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对总消费的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净效果如何要看实证分析。本章通过实证分析,对现阶段我国的技术创新、高收入者投资办厂创造的就业机会究竟能否和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八章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对总消费的影响,社会保障因素是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有研究的必要。本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刺激或挤出居民消费的作用,既可以在理论上成立,又能在我国现实中获得经验支持。但是与费尔德斯坦对美国的估计结果不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作用。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从动态上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降低了我国居民的资产替代效应;从静态上看,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等级性”的。各个阶层之间享受的社会保障有一定差距,这导致了社会保障刺激某些阶层消费的作用被其他阶层所“稀释”,结果导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需要取消等级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与居民的身份地位“脱钩”,建立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实际上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重构社会保障体系以刺激居民消费,这是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另一条途径。

第九章要阐明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分配政策。本章首先具体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不振的原因,并利用新的估算方法证明农民阶层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是近似的。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刺激各阶层的居民消费需要实施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除收入再分配之外,本章还论证了收入再分

配的替代性政策,即如何从政策上发挥技术创新、就业机会启动消费的作用。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我国居民收入的非规范化,有可能使收入再分配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原因是在居民收入不规范的前提下,收入再分配力度的加大,可能不会使高收入者承担起转移支付的社会责任,而是加重中等收入阶层的负担,从而起到缩减居民消费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存在,迫使我们认识到通过收入再分配刺激居民消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其职能,为收入再分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1.3 本书的主要价值和不足之处

笔者认为,本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本书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即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关系,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率最高,为笔者与人合作的论文中首先提出^①。现代西方消费理论,或者是认为消费与收入无关(如随机行走假说),或者是认为消费率和边际消费率与收入多寡无关(如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或者是认为居民收入增加与边际消费倾向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如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的消费函数是凹函数假说(Carroll and Kimball,1997)。国内学者的论点也基本上都是上述论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结论具有一定原创性,而且实证分

^① 杨天宇,朱诗娥.中国居民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的倒“U”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析证明它符合中国国情。从这个结论出发可以得出的政策含义与西方消费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它意味着收入和收入分配不但对消费有影响,而且影响的方向并不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要刺激居民消费,更有效果的应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简单地补贴低收入阶层,即使要刺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也应该以实物补贴而不是货币补贴为主。这可以被看作是本书的主要理论贡献。

第二,本书花相当大的篇幅论证了技术创新、高收入者投资办厂创造的就业机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许多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有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因此可以替代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几乎没人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书对此进行了尝试。实证分析表明,这两个因素并不是无条件的具备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尤其是高收入者投资办厂创造的就业机会,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本书从理论和现实条件约束等方面,探讨了这两个因素刺激居民消费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这对于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刺激居民消费,具有一定意义。

第三,本书也研究了最有利于扩张居民消费的城乡和城镇内部最优收入差距问题。此问题曾有过零星但不系统的研究,而且仅限于城乡差距。本书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没有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问题。笔者不敢奢望这些观点能够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但它们确实是笔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以看成是“一家之言”。

当然,由于本书的研究内容对作者的理论功底要求很高,又由于本人知识的浅薄,加上时间有限,致使一些论述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本书最多只能说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研究框架,它的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和补充。

首先,虽然本书得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为什么与西方消费理论有区别,是数据问

题,国情或制度约束问题,抑或是理论模型构建的区别所导致的,都还不得而知。显然,如果本书的结论具有普遍性,即不仅仅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那必将对现有消费理论形成一定的冲击。本书的研究意义也需要重新估计,不过结果是不是如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当然,即使本书的研究结论没有普遍性意义,而只适合于中国,那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即是什么因素会使得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行为区别如此之大,这也是有价值的。

其次,为了技术处理方便,本书模型的构建以可检验性和可预见性为目标,没有为本书的结论构建微观基础。虽然过分追求微观基础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我们为本书结论找到了微观基础,则有利于将其与西方消费理论相比较,从而更容易看出中西方消费者行为差别的原因在何处。而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本书的结论是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有重要的影响,合适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具有刺激消费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一些中国特有约束条件的限制,如居民收入的不规范化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大打折扣。本书第九章对此有所论述,但还很不深入。还可能存在其他影响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的因素。所以,要真正弄清楚本书理论和政策含义的实际价值,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